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

王建民 潘 蛟 / 主编

人类学

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

理论实践
(修订版)

[美]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Michael Herzfeld) / 著

刘珩 石毅 李昌银 / 译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华夏出版社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

王建民 潘 蛟 / 主编

人类学

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
理论实践
(修订版)

[美]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Michael Herzfeld) / 著

刘珩 石毅 李昌银 / 译

Anthropology :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美)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著;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

ISBN 978-7-5080-5110-9

I.人… II.①赫… ②刘… ③石… ④李… III.人类学
IV.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035 号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by Michael Herzfeld
© UNESCO 2001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Blackwell Publishers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1805

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

[美]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著

刘珩 石毅 李昌银 等译

责任编辑:田娟华 孙颖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开

印 张:25.5

字 数:398千字

定 价:47.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经过修订和大家见面了，这套教材是由王铭铭教授策划的，包括国际人类学界在世纪之交前后出版的五种著作，作者也都是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考虑到作为一套丛书，这五本书也是各有侧重。从基本概念、人类学概论、学科发展史和理论史到田野工作方法，覆盖了作为文化人类学基础的几个主要部分。然而，选入这套丛书的这些著作又不是简单的教材。如《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一书，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编写的，领衔作者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教授，没有像通常的《文化人类学概论》那样四平八稳地展开教科书式的讨论，而是用一种反思“常识”的眼光来展开思辨性的讨论。其他几种作品也是可以用作教材但又高于教材之作。这套丛书出版之后，以学术著作难有的速度很快售罄。我们在这一次修订中，将过去改译书名的两本书重新订正，回归本来面目。

学术史是学术研究和训练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学家的成长道路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有些人可以先搜集和积累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或者说对生活的详细观察有所收获，开始觉得有研究的必要，需要解释这些材料。于是乎通过阅读和请教，学习人类学理论，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熟悉不同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路径，再加上用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技术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人类学家；另外一些人，在已经学术制度化的今天主要是从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在大学课堂中学习相关的课程，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听各路名家的讲座，然后再去进行田野工作，进行田野民族志写作，最终完成从学生到人类学家的历程。

这两种人类学家成长的历程应该说都是“悟”的过程。两种途径都需要理论，只是理论先行还是田野先行的顺序有所不同，即

是先有了田野积累然后去领悟理论，还是先经过理论训练再去体悟田野的差别。不论你走哪条道路，理论与田野民族志实践总是不断互动的。有了一定的理论积累，就要考虑怎样用于田野实践，怎样在田野中发现生动的、可以延展理论的宝贵材料。而有了很好的田野材料，如果没有丰厚的理论积累也无从解释。或者涉猎了一些解释模式，但知之不深或者不了解对这一模式近期的批评和讨论，就会影响田野民族志写作的质量。在学术严谨的过程中，也许有人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式，或者对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田野民族志作者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写出的田野民族志作品怎么谈得上较高的学术水平、较深厚的学术造诣呢？不注重理论的继续学习必然落伍。这就是人类学中所谓理论与田野工作关系张力的表现。

在大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课程中，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奠定良好的学科基础都是最重要的。从学科基础开始，如果按照规范的教学路数，首先要明白概念，要读概论，要熟悉学科史，还要关注研究方法。人类学专业的学位论文通常也必须要有人类学相关理论的追溯，也可以叫做“方法论”（methodology），要求学生追溯在要讨论的那个问题上前人已经做了什么，哪些做得比较成功，还有哪些不足或缺陷；再就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用什么方法，怎么用，为什么要用研究者选用的那些方法。我们做的新研究就是在田野民族志材料和理论上对前人研究的超越。不然研究还有什么学术价值？全面了解、深入钻研并勇于质疑才是真正的“学问”。

学术史的追溯能够使学科从业者不断增长学术问题意识。问题怎样才能够提出来，当然要有不断质询和思考的习惯，但是更要有丰厚的学术积累。也许一位年轻气盛的学子能够不断地向权威提出“问题”，我们在鼓励这种精神的同时，也需要考量这种“问题”是不是学术问题。人类学学术研究需要积累。我认为，这种积累主要是说两个方面，也就是田野工作和理论。田野调查固然非常重要，而且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不过，并非去了“那里”，就是做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我们应当掌握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比如怎样拟定调查提纲、怎样做深度访谈、怎样记录和整理资料，等等。在比较研究中也需要知道如何进行比较的相关问题，使研究不至于走上古典联想主义的任何事项的胡乱连接和对比较对象彼此间关系的任意臆想之中。人类学田野工作要讲究方法，在明了怎样做之后，

必须有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考虑。于是就过渡到理论的层面。再细分的话，涉及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关于问题的理论。前者是说从人类学知识的性质、田野社会关系、学术伦理及价值和田野民族志著述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后者则是不同人类学理论流派对相关问题研究分析的基本取向、出发点、主要理论、重要概念和假说等方面的学术争辩。学术史的学习是我们有可能把握这些论争的线索，并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去质疑现有的理论范式，提出你的见解，从而以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话语参与学术讨论，丰富人类学思想库。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这套丛书及其他相关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中国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一些有关人类学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一些国内学者编写的人类学教科书也先后问世，对学习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颇有帮助。但是，国内的大部分人类学学科理论史及方法论专著，由于写作年代较早、国内研究资料或研究与写作时间的限制等原因，其中许多著作也没有能够具备人类学学术思想渊源到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这样宽广的视野，缺乏对某些新出现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认真思考，在评述立场上也许难于把握分寸。在目前国内的人类学教学中，一些大学专业系科往往面临教科书难以买到或不便使用，参考书匮乏的窘境。三年前华夏出版社推出了“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所选书目起点高且多为近年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在人类学理论教科书编译方面的一大进展。现在经过重新修订后，作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之一，再次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以饷读者。

从目前来说，在中国人类学的建设过程中，当西方人类学已经开始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反思，批判现有的理论范式的时候，中国人类学家却不得不在反思和参与国际学术界现有讨论的同时，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研讨方面开展大量更基础性的工作。最近几年来，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某些场合中，人类学甚至成为了一个具有“些微”霸权的词汇，许多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和人类学联系起来。对大多数人类学家来说，这应当被看成是一种非常喜人的现象。然而，什么是人类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究竟有什么特点，对许多学生来说并不清楚，甚至有些已经对公众大谈人类学的人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相当大的误区。在人类学的发展中，一方面要促进跨学科合作，在问题研究中淡化学科边界；另一方面又要明确学科认同，建立学科共识。对于人类学学科所面临的学科纯洁性与跨学科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处理，需要有更为系统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在我看来，对国外理论与方法的引介和认真研读是这项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样，我们在编撰和翻译这套译丛时，也必须考虑到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系统性和兼顾性。基于对中国人类学界参差不齐的学术基础的考虑，在翻译《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二版时，将作者已经从第二版删除的五个第一版收录的词条作为附录再次列入，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和检索。

我相信，这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科书，能够对中国人类学的推进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可以很好地满足学术思想史和研究方法论训练的需要以及中国人类学界及其他朋友们当下的迫切要求。尽管译本难免有不够周全和细致之处，我想代表所有译者说，我们很乐意承担并愿意努力做好包括翻译和修订在内的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王建民

2008年5月8日于北京魏公村

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晶

其他参与本项目的学者包括：

Marc Abélès Nurit Bird – David
John Borneman Constance Classen
David Coplan Veena Das
Sara Dickey Arturo Escobar
Néstor García Canclini Don Handelman
Ulf Hannerz Václav Hubinger
Kay Milton Juan Ossio
Michael Roberts Don Robotham
David Scott Nicholas Thomas

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行的《国际社会科学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第 153 期（1997 年 9 月）和第 154 期（1997 年 12 月）中找到。

序 言

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唯一以发展和促进社会科学为目标的联合国授权代理机构，其主要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来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对世界和平与大众的福祉作出贡献”。^①

50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已在全球各个国家展开工作，它一直十分关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且致力于证明社会科学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这一事实。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强调人类学学科以及人类学方法对于理解日渐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的社会发展动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本书原来计划是一本人类学教材，但实际上成书之后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本的期望值。该著作将带领读者进行一次启迪思想的航程，它涉猎到人类学的方方面面，并深入探讨了一些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虽然该书向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全面的人类学画面，但其读者绝不仅仅限于学术界，任何对目前某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哪怕对人类学知之甚少，仍能从该书所涉及的不同领域中找到令人欣喜又不乏洞见的观点。在此，我也向那些从事发展研究和实践的工作者强烈推荐这本书，因为该书向当今正在主宰政治和经济决策的一些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由于前言部分已对该书的成书原因和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在此我亦无需赘述。但是，我想向为本书的写作贡献自己的著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1945年11月16日，伦敦。

作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们表示敬意和感谢，他们无一不大度地接受了我们所提出的“有异有同，团队协作”的工作模式，因此这一集体成果才能如此优异。上述学者论文的原文均刊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发行的《国际社会科学期刊》第 153 期和第 154 期上。此外，我还想感谢该书的主编 David Makinson 和他的助手 Glynis Thomas，他们为该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最后，我想对该著作的作者进行一下评价。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教授的学术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这本著作无疑再次证明了他所具有的非凡的分析能力和学术洞察力，此外，他也用其娴熟、睿智的写作证明了他与其他学者以及读者的沟通能力。除了学术能力之外，他做事始终如一、追求完美、热情大方等个人品质也使该书成为学术界的一大亮点。

在向读者推出该著作的同时，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希望能够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强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部项目官员

Nadia Auriat 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部部长助理、项目负责人

Ali Kazancigil

前 言

本书是就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做的一个全面概述。众所周知，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主要探究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给这门学科下个定义，而又不带一丝恶作剧色彩的话，它应该是在文化形式和社会意义两方面对人类的常识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

本书是在早期出版的一些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些独到见解以及这门学科诸多奇特之处。本书主要围绕一系列相关论文展开，这些经过作者授权的文章曾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上发表过，并且文章的作者多是我仰慕已久的。在我看来，他们的著作非常符合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首先，他们对现代社会文化理论中唯我论的两个极端——带有明显教条主义痕迹的后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持怀疑态度。因此，同唯我论者保持一段距离才是批判的最佳位置。我在其他文章中对这一位置有过描述，称其为“不偏不倚却又不乏攻击性”，也就是说，占据这一立场不但不会作茧自缚，而且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灵便，可调适性也很强，从而使自己的观点切切实实建立在对经验的评判上（Herzfeld, 1997a）。同时，坚持这一立场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再像唯我论者一样为自己所倡导的理论而沾沾自喜，骄傲自大。这一点本人同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有着相似的见解，我们都将这一立场称作“不偏不倚的视角”。

其次，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一种意识，这一意识在人类学的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因为具备这一观念的人坚信，人类学诸多显而易见的挫折和困境恰恰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务实的态度，这有助于他们对认识论进行全面理解。在此想重申的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之

上，同时又虚怀若谷的学科最终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是那些鸿篇大论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类学应该被视作积极参与到整个社会之中并展开批判的典范，而不应该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傲慢专横的阐释。这样的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既可针砭时弊（例如 Ferguson, 1992），也可评论职业实践（Balslem, 1993；Kleinman, 1995），还可批判建立在民族志基础之上的现象学（例如 M. Jackson, 1989）。然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便人类学研究的领域非常边缘化，但它仍为批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材料。同时还必须保持一种谦恭的态度，从那些掌握了权力并且界定了权力中心的人士的观点出发，来分析人类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边缘的地位。

不偏不倚的立场何在？即，两个极端之间，什么位置才是最佳的反思距离？这个位置就在极端的实证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因为二者惯以自我指涉和自我开脱的辞令摆出气派的阵势，所以并不可取；它就在脱离实际、抽象难懂的宏大理论与内在封闭、自我专注于地方性或整个“国家”层面的研究之间；它就在沾沾自喜的唯理论和同样自鸣得意的虚无主义之间。这一位置也跨在其他二元对立体之间，使得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惯常设定的界线毫无意义。这同时也使我们重新考虑发生在英美两国学术界的那场论争，这次论争就像是一场傀儡战争，英美双方分别代表二元对立体中的一个极端，大家都以为理论范式可以成功解决两国学术界相互的（有时可能是刻意的）隔阂和争端。当然，这一不偏不倚的立场不能同互让妥协或者相互恭维奉承混淆在一起。相反，它应该被视作一种感召，呼吁人们利用这一门学科与众不同、包容并蓄的特点来加深我们对人类的生存现状及其表现形式的认识和理解并做出独到的评判，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有些主宰学术界且颇为时髦的二元对立论话语只会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立起来，这也许是政治真实情况的反映，但却无助于我们对这个饱经沧桑却又高度社会化的世界做出正确的解释。最重要的是，这一感召激励着我们去尽力把握真实，不要草率地对现实做出简单、专横的表述。

然而，这无助于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20 多年前，当我还是牛津大学一名学生的时候，曾经碰到一道颇为有趣的试题。这道试题问大家，你是否相信学者们能编撰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教科

书。我想，出题者的真实意图或许在于想要学生表达对这门学科的敬畏之情，顺带再表白写作人类学教科书无异于痴人说梦。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并不打算将本书作为一部人类学教科书。之所以知难而进、为所不能为是由于时不我待，20多年转瞬即逝，情势越发迫人。正如我业已提及的那样，本书与典型的教学用书相一致，尽管不必一定要在课堂上使用，但也可将其作为一门教学工具，因为我们大家无论课堂内外都像学生一样需要学习。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暂时摈弃了对这门博大精深、包容并蓄学科的敬畏情感。近来，一些富有见地、思考缜密的观点不断涌现，其中不乏对我们这个世界和人类诸多休戚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和评价，而我只想参与进去，这便是本书写作的初衷。另外，本书是一门激发人们去思考的工具，而非面面俱到的万能良方，这正是人类学应该具备的教学和引导作用。当然，这同时也是本书遭到提倡合乎规范者强烈反对的原因，这类人形形色色，包括官方意识形态理论专家、计量经济学家，以及西方文化（或者其他任何文化）霸权主义的忠实捍卫者。

由于本书成书时的特殊原因，使得它激发人们去思考的宗旨得到很好的贯彻和体现。本书各章的编排和写作均来源于我的同事写成的诸多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异彩纷呈、视角多样，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同时又不乏论证的技巧和艺术。本书并非简单地把这些文章统统吸收进来、为我所用，引用的仅是一些细节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得到了文章作者悉心的帮助和指点。此外，作者本人对这些文章做了大量的删减和增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找这些原文，以便了解笔者保持原文连贯和统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调观点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而不是一味消减和抹杀不同的见解。希望读者能对本书写作所遵循的这一过程做出自己的判断。诚然，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就意味着微妙的差异和不同的见解在所难免，而这正是本书的意旨所在，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并不和谐且观点纷呈的文章去激发读者进一步思考。当然，这些文章还不具备事关“文化冲突”这一层面上的文章所固有的激进程度。

因此，如果“教科书”这一术语意指任何程度的包容并蓄、完善备至并合乎规范的话，那么，本书事实上并不能算作一部教材。当然，本书在界定“不偏不倚却又不乏攻击性”这一概念时确实带有主观规范性的色彩，但这一做法势所难免，因为诸如资本主义经

济、民主的逻辑以及科学的断言之类早被人们视作当然的现象其实都是文化和历史附带的一部分，而我们若想继续沿用这些由于文化和历史因素而一成不变的概念就必须如此。

本书各章的标题也反映了作者的一部分策略，主要是为了使本书的论述更为新颖，不致因循守旧。诸如亲属关系、种族以及宗教等广为人们熟知的陈腔老调已经从标题中消失了。但文中仍有它们显著的一席之地并通过一两种方式时时在各章中加以体现。一门学科的历史渊源是不能轻易舍弃的，它从前所关注的许多主要方面不会马上变得微不足道，相反，它们变成了这门学科“常识性”问题的一部分。此外，重视这些传统领域并对那些导致人们认为诸如“种族”等话题只不过是学术界无中生有、故弄玄虚的固执和成见提出挑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被诸多问题困扰的世界。种族问题便是这些问题中较为严重的一个。“种族”这一个概念很容易被认为包含一个最基本的、不容变更的实质，对这一实质提出的任何质疑要么是行为癫狂、精神错乱的举动，要么正如本人所深信的那样，是一种激发人们去思考的聪明手段。本书的读者如果能耐心细致、自始至终通读所有关于种族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等概念的论述，不但会发现这些论述尽管相当分散，实则互为联系、自成一体，而且还会明白上述所谓实质性的概念不再有水晶般晶莹剔透、诱人魂魄的魅力，它们往往含混不清，操纵性和诱导性强。由于这些概念充斥着修饰性的冗词赘句，其空洞的实质很容易被掩盖起来，受其误导是相当危险的。

出于一些与之相关的原因，作者没有另辟专门的章节对法律和医学加以探讨，这并非是因为它们不重要，相反，它们时时在论述的方方面面得到融会和体现。比如，医学人类学所专注的问题就通过对苦难、象征体系、认识论、性行为、仪式、政治、审美等各个方面的论述折射出来。法律人类学所关注的主题向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法律相关的规范、实施以及颠覆等问题在论述中也得到了体现。我在本书中只想将这两个领域无所不在的性质标识出来，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将二者置于单个的章节中详加论述何其愚蠢，由此产生的误导也是极其严重的。

亲属关系这样一个略为显得陈腐的话题也同样融会于全文之中。亲属关系曾经是一个困扰众人并且颇为专业的问题，它留存至今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因为这一研究领域现在已经过时。实际上，亲属关

系网络复杂严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处处发挥作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波斯尼亚发生的惨剧能否视作一个文明的崩溃？抑或是宗教信仰间的冲突和争斗？还是由种族问题引发的暴乱？那些蒙受屈辱和痛苦的母亲和女儿们是否注定永远成为男性恣意报复这一不变准则的牺牲品，而所有的调解和斡旋始终对这一准则束手无策。或许这些惨剧是人类父系亲属间根深蒂固的宿怨最终发泄的结果，虽然其在全球范围内已呈现出颓废的趋势，但它的破坏程度对人类来说仍然是毁灭性的、绝无仅有的。问题的起因可能还远不止这些，但我们决不能忽略亲属关系这一维度所发挥的作用（现在通常和性别一起出现），忽略它，我们会变得和新闻记者没什么两样，都在对令人费解的现象不假思索、任意诠释并对那些陈年旧事津津乐道，试图制造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这些记者的报道都对他者极尽修饰夸张之能事，从而为整个西方社会寻求自我安慰，开脱由自己引发因而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然而，如果像早期的教材一样将亲属关系作为自在之物来孤立地对待，无疑是在延续一个西方的神话。这个神话将亲属关系看做人类社会属性的基石，它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外来社会的奇特现象。其实，亲属关系无处不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同我们称作“民族主义”的宇宙论紧密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将亲属关系用作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新近发展起来的对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现象的关注必然极大地改变它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类似这样被不假思索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概念在人类学领域还有很多，因此，对这些我们称之为常识性和显而易见的问题提出质疑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不可推诿的责任。

按照作者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所发文章的惯例，本书各章的标题均采用复数形式（比如 *economies*），并且主要针对一些与现实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例如 *environmentalisms*）。^①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强调人类学家应该用批判的眼光对待那些被普遍认为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唯一准则。标题采用复数形式是对这些绝对准则提出挑战的一个好办法。1992 年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主要围绕一句口号展开交锋，这句口号是：“低迷的经济、愚蠢的政策（经济一词在此用作单数）！”很明显，一向自我标榜民主和多元的美利坚民族此时却

① 鉴于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异，再加之标题的简洁性，本书中文本各章的标题并未使用复数形式，但其意从内容上显而易见。——译者注

思维狭隘，固执地认为一个单一的问题将决定所有事件将来的发展走向（此处用作单数形式的“经济”一词也代表一个单一的现象）。在英语中，单数形式与定冠词连用——比如“地道的土著”（the typical native）——通常明白无误地表示概念上的封闭。同样的用法——比如“意大利人（the Italian）不尊重法律”——肯定会招致巨大的误解和各种各样的猜测：他们是在自我庆幸，沾沾自喜呢？还是在自我解嘲？或者是在嘲弄那些自以为是的旁观者对他们所做的评论（包括人类学家）？尽管人类学家用定冠词“the”加在这一类人或那一类人之前的著述颇丰，但他们还是凭借敏锐的目光观察到了人类这种强烈的闭合愿望，或许还特别欣赏其中所包含的自我解嘲意识。然而，惯于使用定冠词对事物下定论的做法并不能使人信服西方简洁、理性的高明之处。如果我们能对每一个观念保持开放的心态，那些似乎高不可及、难以逾越却又意义深刻、占据支配地位的“既成事实”就会成为人类学研究最为恰当的主题，同时也成为这一领域内的关键性符号，人类学不应局限于对一些偏僻、充满异国情调的社会进行奇闻轶事般的描绘。

很显然，人类学是一门惹人厌的学科，这也是它不大受欢迎的原因。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痛斥人类学的展室内陈列着帝国主义强取豪夺、侵略扩张的斑斑劣迹，而民族主义者则借着新近死灰复燃的民族统一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东风对它痛加辱骂。人类学不可避免地与任何按照单一文化模式塑造这个世界的企图格格不入；人类学固有的比较研究的兴趣无疑使其成为极权主义者怀疑的对象；人类学者无所顾忌、穷追不舍的好奇心也使得普通人对他们顾虑重重，戒心难除：我自己也曾被怀疑是一名间谍，专为外国势力和地方政府搜集情报。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人类学不惜以换取承认为代价，受利益驱使，甘愿为某些强权政治效劳，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比如一本名为《雅诺马莫人：好斗的野蛮人》（*Yanomamö: The Fierce People*, Chagnon, 1968）一书的标题实在是欠考虑，此书显然为那些试图对雅诺马莫文化和人口加以灭绝的人提供了绝佳借口。然而，对于那些善意且思想开放的人类学家而言，这些事件反而成为这门学科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加以完善的自觉意识和道德心的一部分。

写一本关于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书，而又侧重于列举而非归纳总结，这还将面临一个特殊的挑战，即，从何说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两步走”的安排看来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国际人类学界的众多同行们曾经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的两个特刊上发表过文章，而我则根据自己的偏好对这些文章进行修订，以此作为本书的出发点及各章的内容，由此造成的对他们的观点和思想的修订也在所难免。当然，他们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对于我所专长的研究领域也颇有帮助，本书将它们编排一处，扩展了这些观点供人思考的空间和余地。我的人类学同行们的睿智和渊博的知识是我可以依赖的基础，我相信自己也能在本书中将他们的观点立场清晰无误地表达出来，同时试图通过这一复杂深奥的讨论或多或少地为人类学建构起一个内在且连贯的视角。作者十分感激他们能同意我的这一计划并且让我对这些文章进行校订，以便使这些曾经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更能凸显其作者娴熟的专业水准。当然，因为我的自作主张和不当修订所带来的缺点错误可能势所难免，为此，作者承当全部责任。很多同行看过本书的初稿之后一直密切关注它的修订工作并提出意见，我尽量在格式允许的条件下保持这些探讨和对话原有的风格和特点。

读者（及作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各章程度不等地吸收了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上的诸多原文的观点和想法（尽管作者本人对那些原文照引的段落加上了引号）。重新安排材料是为了使本书各章不致和所引原文看上去一模一样（一字不差引用原文而又不注明引号则表明所引内容来自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期刊》上的文章，此外，如果所引内容是我们互相交流探讨的谈话，我会加以注明）。这样，本书所引文章不至像利用模本一样生搬硬套，作者对这些文章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变动并对所引内容精挑细选，试图使它们能以积极主动的形式参与到讨论中去。所引文章的作者对本书的最后一稿做了很多评论，为了诚实起见，同时更为了像本书所坚持的宗旨一样——将读者引入各种讨论之中——我将这些建议和批评一并吸收，让其在书中得以体现。此外，我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吸引大家对这门学科各领域的关注和兴趣，而这些广阔的领域并非深不可测，非专家莫属。同时，本书则是这门学科通过时下诸多前沿的“探讨和对话”得以体现的一个生动有趣的版本。

其实，本书的这种创作模式与目前对民族志的认识是相一致的。民族志是人类学田野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学赖以描述的主要